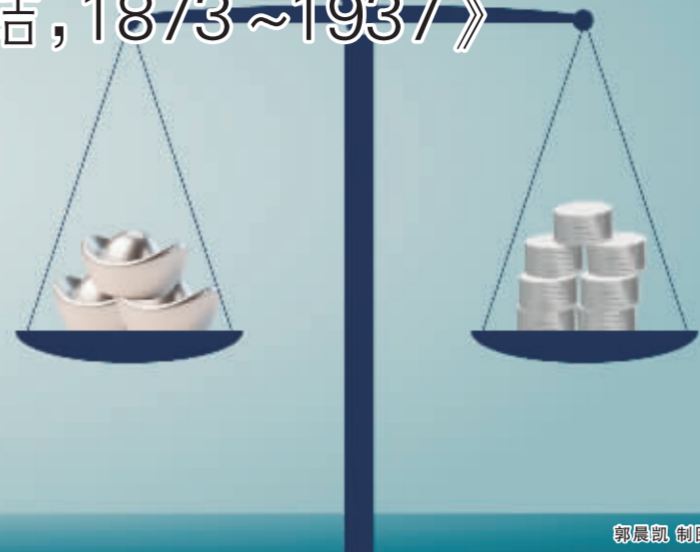


白银:中国近代货币变革的缩影

——读《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



《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
(美) 奥斯特·迪恩著
葛宇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郭展凯 制图

◎ 禾刀

凯恩斯曾说过,黄金是野蛮的遗迹。那么,白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当初凯恩斯代表英国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如果英国黄金库存充足,凯恩斯还会坚持摒弃黄金吗?之所以提到凯恩斯,是因为作为世界最后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中国曾陷入类似的困境。

19世纪末,作为世界上使用白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使用白银货币的过程中,存在币制杂乱等突出问题。白银在国内市场上的每一笔交易都成了一次“智慧的较量”。本书作者奥斯特·迪恩长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在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视角,还原了中外官员、银行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为推进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奔走建言的场景。在奥斯特·迪恩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不仅点燃了中国人反抗列强的勇气,还激发了中国人在币制改革方面的觉醒,中国人努力通过建立统一的货币标准,实现货币主权。然而,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西方国家以一己之私,企图主导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也为白银的终结敲响了丧钟。

交易成了“智慧的较量”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白银一直是仅次于黄金的重要财富标志。在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下,随着全球贸易的日益频繁,1550年至1650年期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重要的货币金属。

但是,白银的计量标准却五花八门。据作者在书中叙述,19世纪的中国,虽然各地都以“两”作为白银的记账单位,但是每个单位的精度与重量都不同。据历史学家戴建兵估计,在晚清,全国至少有170种不同的常用银两标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在使用白银结算时,往往颇费周章。作者在书中戏称,每一次的白银交易都是“智慧的较量”。

在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货币体系已经千疮百孔。从1808年至1850年,中国白银外流了3.84亿美元,但是到1856年到1886年又有6.91亿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虽然流入的银元缓解了白银紧张的局面,但是官僚阶层并不认同,首当其冲便是货币的主权属性。商人郑观应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钱币,不应该使用其他国家的钱币”。为了对冲外国货币的影响,清政府开放各省的铸币权,但是由于技术参差不齐,各省银元成色差别明显,给货币市场又添加了新的混乱。

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是,白银价值并不稳定。1901年9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史称庚子赔款。与过往不同,这次赔款要求“按海关对各国金本位制货币的比率计算”。即条约虽然注明的是海关银,但是要以黄金价格结算,这意味着清政府要承担更多汇率风险,除非白银价值上升。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勘测技术的进步,美洲、澳洲等地先后发现大银矿,这使全球白银产量快速上升,加之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使用白银货币,全球白银价格正在不断下跌,这意味着对于以黄金计价的赔款,清政府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

奥斯特·迪恩的“智慧的较量”,显然是对当时货币制度无序的写照。虽然,商人乐于在其中逐利,但是货币体系的四分五裂,必然会造成更多损失。寻求统一的货币标准,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不断尝试的白银改革

从晚清时期一路延续至民国时代,白银退出中国货币体系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挽救白银的货币地位,各方曾数度付出努力,而奥斯特对这段跌宕起伏历史的描写,生动地勾勒出了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兴衰沉浮。

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白银货币,选择了金本位制。然而,黄金的高度稀缺,加之国内政局的四分五裂,使得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无法紧跟金本位制的全球潮流。张之洞认为,金本位制方案会让太多的中国主权。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愿意放弃管理自己金融事务的权力。奥斯特认为,张之洞并非反对金本位制,他只是认为时机不成熟。

清政府试图在统一币制上做出改变。作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奠基人的张之洞,在广东率先铸造“龙洋”,于是各省竞相效仿。但是,由于成色不足,“龙洋”未能广泛流通。张之洞的努力也未能挽救清于危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1年,国内流通的银元货币中,有一半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鹰洋”。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倡导“钱币革命”,力图

终止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推行无贵金属支撑的纸币。这一设想契合世界货币发展趋势,展现出深远的战略性。然而,尽管晚清已成往事,但中国却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各路军阀割据、地方势力割据,货币种类繁多,成为币制改革道路上几乎难以跨越的障碍。

1914年,国会在袁世凯解散前通过了《国币条例》。该条例选用了银本位制,并且指出中国应向金本位制努力。依据《国币条例》,俗称“袁大头”的银元在南京、武昌等地铸造。同时,在法律上对“袁大头”的成色和铸造工艺进行了明确要求,较好地保证了货币成色与质量。“袁大头”不仅迅速取代了先前劣质杂乱的“龙洋”,还在市场上对曾风光无限的“鹰洋”形成压倒性优势。到1924年,在流通的9.6亿银元中,“袁大头”占据了7.5亿之多。对此,奥斯特在书中评价认为,尽管新的白银货币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但相较于以往标准繁杂、混乱复杂的局面,“袁大头”的出现,确实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与张之洞的看法相似,认为“金本位制虽然是一个完美的货币本位制”,但在国内可能水土不服,“因为所需成本高昂且中国人有囤积贵金属的习惯”。作为近代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则建议禁止白银进口,以确保国内货币稳定。

奥斯特认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其货币改革的阻力从来不只来自国内,更有国际势力的介入与干预。

白银货币的黯然谢幕

白银在中国近代史的遭遇,本质上是一段国家穷困的屈辱史。

自晚清以来,作为中国货币的白银便遭遇重重困境。一方面,凭借坚船利炮,列强在金融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掠夺。据作者在书中叙述,各国银行在中国大量发行货币,这些外国货币与中国本土货币,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时市场上流通。例如,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等都在中国发行了各自的纸币。这些外国货币的发行并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其发行量和价值稳定性完全取决于发行银行所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权力和货币市场的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实力受到削弱,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20世纪初,随着不同国家试图将中国货币与本国货币单位挂钩,中国很快就成为“各种金汇兑本位制计划竞争的战场”。各国纷纷借助货币贷款,频繁施加压力。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无他国能及。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迅速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在这场争夺中,作为自明治维新后崛起的国家,日本也暴露出前所未有的野心,“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宣布日本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并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提供任何‘其所不乐见的援助’。”

这就像是一场弱肉强食的盛宴,桌边坐着的是列强,而中国则是这场盛宴中唯一被摆在桌上的食物。作为最后一个使用白银货币的国家,中国在货币制度改革上只能仰人鼻息,缺乏应有的话语权。1932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不同银两记账单位,确定了银本位制,迈出了统一白银货币标准的重要一步。然而,随着1933年美国《托马斯修正案》的出台,国际银价一路上涨,直接刺激国内白银迅速外流。据研究,年流出的白银量高达1.8亿两。几乎与此同时,已经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大肆收购走私白银,破坏白银货币的稳定。

在全球白银产量高企,并且只剩下中国还在使用白银货币之际,理论上白银供应本应充足,但是事实上却在国内市场出现了罕见“钱荒”。“钱荒”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推高了币值,也严重打压了出口贸易。在多方势力的围堵下,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脱离银本位制,改用由政府控制的货币:法币。然而,白银的谢幕和法币的诞生,未能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稻草”。

巧合的是,白银货币在中国谢幕之时,正是罗斯福新政的高光时刻。在本书的结语中,奥斯特写道:“20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将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是为了鼓励美国向中国出口。”而在21世纪,“美元与中国货币之间有了直接联系,然而,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称赞这一进展”。奥斯特以讽刺的口吻表示,今天,美国继续试图影响中国的货币,但鉴于长期以来的历史,他们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让头脑极度开放 避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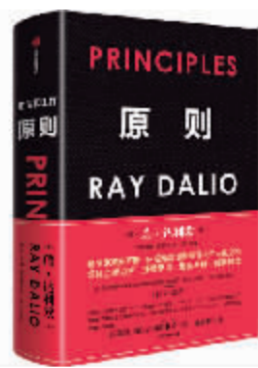
——读《原则》(全新增订版)

◎ 夏学杰

《原则》是著名投资人瑞·达利欧总结自己成事逻辑而写就的一本书,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把我所学到的关于如何正确拼搏的道理传递给你们,以便帮助你们成功,或者至少,帮助你们从每一次的努力中收获最大的成效”。本次新版《原则》专为中文读者增订了更多内容。达利欧善于学习并勤于思考,他总是试图破解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以便不再犯相同的错误。达利欧倡导读者在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中辩证思考、识别机遇、和谐发展,重塑与优化自身和组织的原则体系,以从容应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原则”的由来

什么是原则?在达利欧看来,原则就是应对现实、实现人生愿望的方法。原则可以反复应用于类似的情况,帮助你实现目标。比如,每天我们都要面对大量必须处理的事务。假如没有原则,我们将被迫逐一考虑多种类型的事情,主动去应对,就像第一次经历这些事。相反,假如我们把



《原则》(全新增订版)
(美) 瑞·达利欧 著
刘波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月出版

每件事都看作同一类型事物的又一个表现,以妥帖的原则来应对这些类型的事物,就能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定,从而拥有更好的生活。

在桥水公司的日常管理中,每当发生什么新情况需要达利欧做出决策时,他就思考一下做出该决策的标准,然后将其作为一项原则写下来,这样大家就能看到具体情况,以及他对待这些情况的原则。于是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所有事情都看作类似情境的再现,例如聘用、解雇、确定薪酬、对待不诚实行为等等,而这些情境也有着各自的应对原则。通过把原则明确地写下来,达利欧让大家一起思考、改进并遵守原则,从而培养一种创造性择优的做法。

原则的数量从少逐渐增多。2006年,桥水公司快速扩大,于是达利欧草拟了约60条工作原则的列表,分发给管理者,希望他们评估、讨论和理解这些原则。此后,他开启了一段持续改进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他与公司管理者总结出了几百条几乎覆盖一切的原则,形成了“决策库”。

做到头脑极度开放

“你是在寻找最好的答案,而不是你自己能得出的最好答案”。达利欧认为,影响合理决策的两个最大的障碍是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思维盲点。这两个障碍让人难以客观地看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环境的真相,难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人的帮助来做出最佳决策。

很多人在试图弄明白某件事时,仅仅在自己的头脑中思索,而不是参考所有他们能得到的好想法,结果他们不断地跑向自己看到的东,不断地在自己的盲点上撞墙,直到失败迫使他们适应和进化。

怎样才能做到头脑极度开放呢?达利欧建议:首先应诚恳地相信自己也许并不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并认识到与

知道的东西相比,能不能妥善处理“不知道”才更重要。其次,将决策分为两步,先分析所有相关信息,然后作出决定。最后,要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只有设身处地,才能合理评估另一种观点的价值。

最珍贵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长久关系

“世间最珍贵的事物不是别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长久关系”。达利欧认为,这种信念是建立和维护良好关系的关键所在。

新版《原则》中专门为中文读者增订了更多内容。在书中,达利欧以他的人生经历为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读者要了解自己的天性,选择一条最可能通往幸福和成功的道路;要清楚自身和亲人所处的生命阶段,这样才能更好地回顾过去,规划未来;人会随着时间进化和改变,但一定要有现实的期望。通过这些新的原则,达利欧倡导读者在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学会辩证思考、识别机遇,重塑与优化自身和组织的原则体系,以从容应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达利欧认为,同事和工作场所比工作本身更重要。同事和工作场所构成了人们的工作环境,而环境对人格的影响超过对工作的影响。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在于:一是在相处方式上达成共识,尤其是表达和处理不同意见的方式;二是彼此付出远多于索取,让热情与工作合二为一,并与志同道合者倾力推进。

不要过度依赖人工智能

总体而言,达利欧对用计算机参与决策还是持乐观态度,他对投资对象的成功预判就是得益于计算机科技的发展。因为,与人类决策相比,用算法表述投资决策标准,然后用历史数据来检验,能做出更周全、更少情绪化的决策。

达利欧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编码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未来可能会变得和写字一样不可或缺。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并非万能。常人预言人工智能将与人类智能展开竞争,但达利欧坚信,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携手合作、相互补充,才是实现最佳结果的正确方向。毕竟,计算机想要完全复制人脑的诸多功能,例如想象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创造力,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永远无法实现。这是因为人脑经过亿万年的生物进化,已经储存了丰富的先天能力,这是计算机难以企及的。

许多计算机系统依赖所谓的决策“科学”,但达利欧指出,这种“科学”在价值上远远比不上人类的“技艺”。在那些最重要的决策领域,人类的表现依然优于计算机。只需观察那些最成功的人,就能明白这一点。最成功的并非仅仅是软件开发工程师、数学家或博弈论研究者,而是那些最具有理性、想象力和毅力的人。他们清楚自己重视什么、追求什么,并且能够巧妙地将计算机、算法和博弈论等工具为己所用。

达利欧还强调,计算机本身缺乏常识。计算机模型需要被输入合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解读方式,只有人类智能能够胜任。他指出,世界上最好的决策者是那些既拥有理性、想象力和毅力,又懂得如何利用计算机、算法和博弈论的人。他告诫人们,在没有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之前,不要过度依赖它。当使用者在没有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接受机器学习创造的算法所假定的因果关系,甚至据此采取行动,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达利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应对复杂世界的智慧宝典。原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难能可贵的是,达利欧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他不仅自己积极思考,更鼓励读者独立思考,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原则。他倡导的“头脑极度开放”理念,正是他自身践行的核心主张。这种理念构成了桥水公司与其他企业在企业文化上的显著区别,也给笔者带来了深深的触动与无尽的思索。

■ 披沙录



《日本的财政危机:摆脱危机的体制机制变革努力(1975—2000)》
(英) 莫里斯·赖特著
孙世强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

本书聚焦日本公共预算与政治,追溯日本财政危机的起源与发展。作者在书中详细剖析了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结构和流程,介绍“大藏省”(2000年后称“财务省”)的职能及其与支出部门在执行政府核心职能时的关系,分析其在支出决策和审计方面与其他部委的互动关系。作者借助丰富的采访资料和初级预算数据档案,系统分析日本财政危机的起源、发展及应对努力,解释日本公共债务积累的原因。全书逻辑连贯,章节衔接自然,符合学术著作要求,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日本财政危机的复杂背景和体制机制因素。作者扎实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功底,使分析更具可靠性和说服力。本书适合作为财政学爱好者的轻学术读物,以及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的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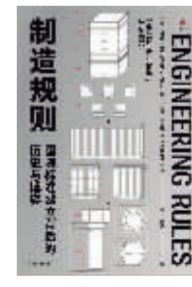
《有为与有效》
周国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5月出版

本书以杭州“六小龙”出圈现象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浙江科创生态背后的发展逻辑,讲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担下的发展实践,是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科技厅厅长周国辉对浙江科技创新的深入思考与总结。在数十年的政府工作经历中,作者深刻领悟到浙江如何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突破传统的创新发展困境,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科创生态。作者在本书呈现了浙江省在科技领域的独特路径与实践,特别是杭州“六小龙”企业的崛起与发展;从浙江的历史、政策、企业及市场等多个维度出发,解读政府与市场如何协同推进创新与转型,探索民营经济、产业融合、科技生态的核心要素;结合具体案例,展现了浙江范式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与潜力。



《拯救劳动: AI时代的呐喊》
(德) 丽莎·赫尔佐克 著
寇琪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当AI时代到来,人类世界的未来究竟会怎样?如何既能防止AI技术成为新的“资本”力量对人类进行压榨,又能利用它创造一个平等、共享的劳动环境?本书作者丽莎·赫尔佐克,1983年出生于德国纽伦堡,是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和政治理论博士,现任格罗宁根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经济学思想的交叉研究,研究重点为经济民主和工作哲学,著有《发明市场:斯密、黑格尔与政治理论》《公民知识:市场、专家和民主的基础设施》等。作者基于人类劳动分工的社会性这一基本特征,在书中探讨了构建数字化劳动世界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责任担当。围绕在数字化时代如何组织人类共存、什么是创建一个良好和公正社会的要素、如何在实践中推进对现有制度和社会生态的改造等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制造规则:国际标准化背后的历史与博弈》
(美) 乔安妮·耶茨等著
应武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4月出版

标准是一个被广泛忽视而又无处不在的社会技术契约,从看似平常的螺钉、插座、水龙头到技术密集的5G、汽车、互联网,标准无处不在,并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标准凝聚了全球工程师、产业界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专业化共识,同时也是协商妥协的结果。本书回顾了标准化的全球发展史,作者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三次技术标准化的浪潮。在第一次浪潮中,工程师制定了可以被制造者广泛采用,同时满足公司客户需求的有用标准;第二波浪潮的结果之一是集装箱的标准化,这极大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全球市场的整合;第三波浪潮的核心是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新一代的标准制定者为互联网和万物网提供支撑。两位作者基于三个大洲的档案资料,探讨了催生标准化运动的积极理念,实现这些理念的尝试,以及标准化运动在今天面临的挑战。